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校际合作” 境外办学模式研究

张子一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对外合作与交流处,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的实践日益增多。现阶段“政府主导”“随企出海”和“机构共建”等三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存在着推广复制难度较大、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够突出、办学质量难以保障等局限性。通过合作方式创新、建设内容创新、思维手段创新,构建“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可有效解决境外办学的痛点与难点。

关键词:“双高”建设;境外办学;校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 TS2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2) 03-0011-06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2.03.003

2019年3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并联合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旨在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围绕该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双高”建设。境外办学是“双高”建设任务中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核心指标,更是实现“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双高”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近年来开展境外办学的高职院校数量不断增多,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批成功范例。随着高职教育境外办学实践的拓展和深入,构建具有可复制推广的境外办学模式,对提升境外办学质量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一、境外办学

(一)境外办学的内涵

本文所称境外办学,特指高职院校独立或者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境外具有法人资格并且为所在地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在境外举办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职业教育机构及其他形式的职业教育教学活动。

(二)境外办学对“双高”建设的积极意义

境外办学是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办学点数量是衡量学校国际影响七大指标之一,直接影响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同时,开展境外办学,可以通过境外教学、“中文+职业技能培训”等国际教育项目,提升学校留学生数量、服务“走出去”企业人次、境外人员培训数等重要指标,对学校提

收稿日期:2022-03-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学研究课题“‘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境外办学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ZJGB2020105)。

作者简介:张子一(1981—),男,湖北黄石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合作与交流。

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具有积极作用。

(三)境外办学的发展

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当年6月,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UCSL大学共建马来西亚UCSL大学顺峰烹饪学院,3个月后,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与美国芝加哥市立大学联盟共建“芝加哥分校”,这两所职业院校启动了我国高职教育境外办学的第一步。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双高”建设,一批综合实力强、办学特色鲜明、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较高的高职院校率先开展境外办学实践,境外办学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各类境外办学项目有效推动了相关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进程,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相关专业国际化发展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43所高

职院校在境外创立办学点48所^[1](如图1、图2、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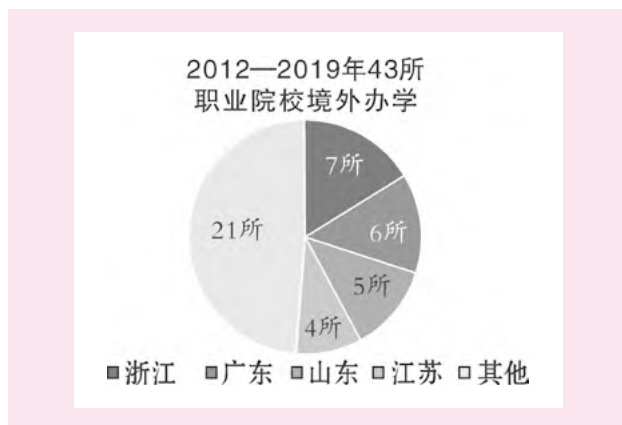


图1 43所开展境外办学高职院校省域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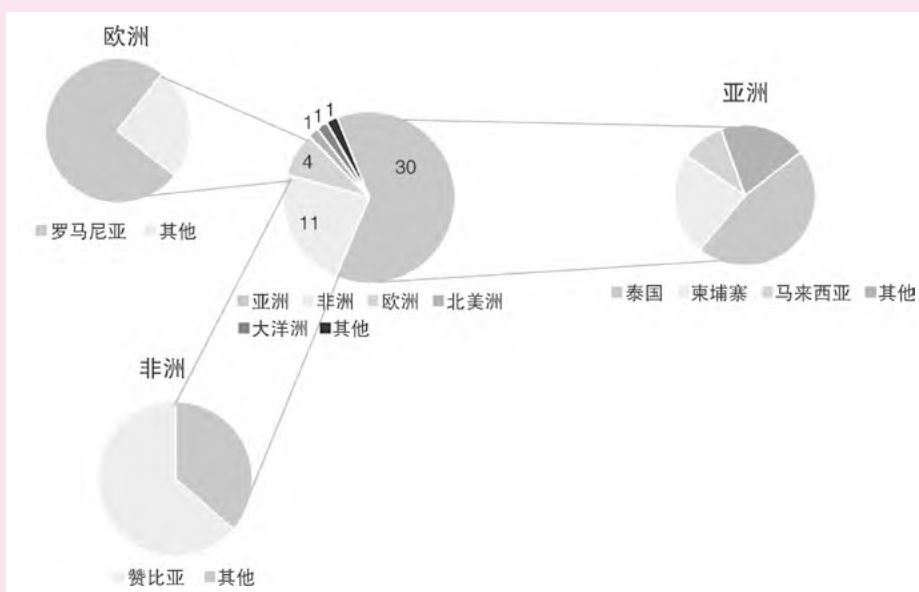


图2 高职院校境外办学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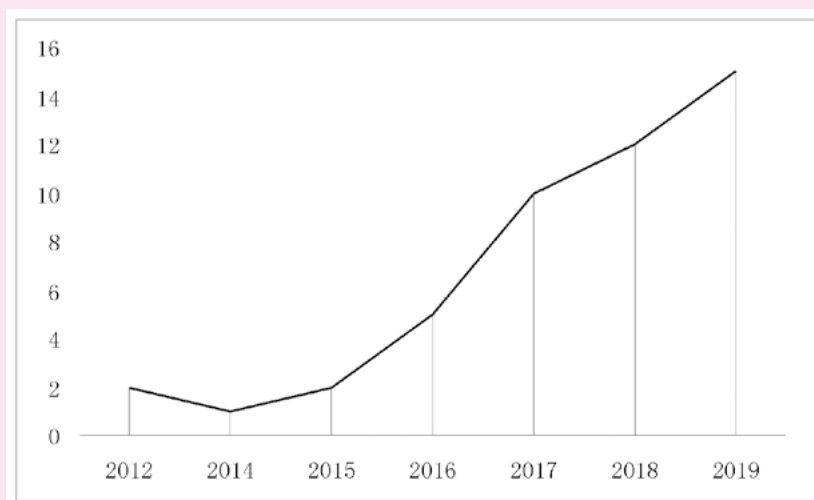


图3 2012—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增长情况

(四)对境外办学的研究

随着境外办学实践的拓展和深入,我国学者对高职院校境外办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以“高职院校境外办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析出25篇相关研究论文,发现这些成果集中发表于近3年,其中11篇与“境外办学”主题强相关。从内容上看,有研究者进行了总结性回顾,柳玖玲认为,我国高等院校境外办学形式开始从单一政府为主导,逐步走向政府委派合作院校跨境输出,再到政、校、企协同走出去^[2];部分研究者聚焦策略研究,周萍认为,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要紧密联系行业、企业,贴近社会对高职教育的需求^[3];部分研究者则侧重于个案,赵丽总结了无锡商业职业学院通过校企联合,在柬埔寨举办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的海外办学实践^[4]。综上可见,我国职教界对境外办学的研究注重于策略研究和个案研究,模式研究还较为欠缺。因此,对于构建和创新高职院校境外办学模式,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主要境外办学模式分析

(一)三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

随着境外办学实践的开展,现阶段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随企出海”和“机构共建”等三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

1. 政府主导型

即政府在境外办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承担了顶层设计、内外协调、经费支持、评估监督等职责,参与项目的相关高职院校根据政府要求,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鲁班工坊”。“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政府牵头发起,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10所高职院校联合天津启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具体实施开发教学项目、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选派师资赴海外教学培训、提供实习实训设备和技术支撑等内容。在天津市政府的统筹和各相关方的积极配合下,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和声誉,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著名品牌。此模式中,政府统一规划、统筹和指导,高职院校获得了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利于发挥办学优势、专注项目实施。

2. 随企出海型

即“走出去”企业在办学硬件方面提供一定的资源和条件(负责场地租赁建设、硬件设备供给及生源招生宣传等),高职院校根据企业需求,选派师资赴境外办学点开展教学培训等办学活动。较为典型的是“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学院由中国有色金属

矿业集团牵头举办,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和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高职院校共同参与建设,接受中国教育部和赞比亚职业训练管理局指导,主要面向赞比亚高中毕业生开展高等学历教育,同时面向中资企业员工开展技能培训,是中国职业院校在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学院^[5]。此模式中,企业充分发挥了海外渠道优势,提供了办学硬件保障,学校只需精准聚焦企业需求,为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3. 机构共建型

即高职院校与相关教育机构合作,机构根据学校办学优势和特色,为学校在境外创建办学点,并协助学校开展办学活动。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扩大开放的政策红利释放,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吸引了众多高职院校参与合作。如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晟经世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唐风国际教育集团等几家有代表性的教育机构,已协助多所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创建了境外办学点。此模式中,学校承担办学的主体责任,机构提供了许多教育服务,如联系海外合作方、完成海外行政审批、参与办学点建设、运营与管理、招收留学生等,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

(二)办学模式分析

“政府主导”“随企出海”和“机构共建”等三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各有优势、特色,但也存在推广复制难度较大、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够突出、办学质量难以保障等局限性。

1. 推广复制难度较大

现有三种主要境外办学模式,对参与学校要求较高,大部分高职院校还不具备条件。政府主导型要求学校获得强大的平台支持,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职业教育开放程度较高,政府部门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支持,相较而言,内陆省份高职院校获得的支持还不充分。随企出海型要求学校具备丰富的企业资源,尤其是“走出去”龙头企业资源,行业背景不强、企业资源不够的学校无法采取此种模式。而采取机构共建模式,由于购买了大量教育服务和教学设备,学校需对境外办学进行动辄数百万元的高额资金投入,大部分高职院校无力承担。

2. 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够突出

学校应该是境外办学的主体,在办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但在三种模式之下,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不够突出。一是主体地位不明显。学校或者服务地方政府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或者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人才需求,或者直接使用教育机构的海外资源和教育服务,常常扮演“追随者”角色。二是自主性受到弱化。学校客观上在办学目标、办学层次、开办专业、课程内容和教学实施等方面受到限制,无法充分体现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三是办学生命周期受到限制。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境外办学均为学校自主实践,项目生命周期或取决于政策调整、或取决于企业战略调整甚至取决于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合作黏性不强,客观上存在一定风险。

3. 办学质量难以保障

高职学校开展境外办学,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在三种模式下,因受限于种种客观因素,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开发、文化传承、对外交流等学校办学基本职能和内容无法充分体现。“政府主导”“随企出海”模式下,高职院校的境外办学以技术技能培训为主,主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人才支撑,涉及其他方面的办学内容不多。“机构共建”模式下,学校对具体运营和教学实施掌控力度不够,质量监控体系尚未确立,人才培养质量得不到保证。

三、以创新构建“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

因此,“双高”建设背景下,对现有境外办学主要模式进行继承性创新,为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提供了新的模式选择,创建既有普适性、又能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主导作用的境外办学新模式,对帮助解决高职院校在境外办学时面临的问题和完善现有主流模式的不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高职院校可通过合作方式创新、建设内容创新、思维手段创新,构建“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即中方院校直接与外方院校合作,在外方院校建立境外办学点,双方共商、共建、共享,联合开展办学活动。该模式适应现阶段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化总体发展水平,具有较强普适性,可复制推广,且有助于高职院校在境外办学活动中彰显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适用于大部分高职院校,具备国际合作与交流基础的学校,均可采用此模式开展境外办学。此模式下,学校开展境外办学对政府平台强力支持、行业企业资源支持的依赖度较低,亦不需要大额、连续的资金投入,可以依据自身办学

实力和国际化发展方向,自主选择合作对象、确定合作内容。因此,该模式具备较高的推广性。

“政府主导”“随企出海”和“机构共建”等模式,虽也有合作方,但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行动、企业需求、机构实力存在依赖性和依附性,办学主体地位比较模糊。“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下,学校是境外办学真正意义的主体。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学校自主决定办学内容,并参与境外办学点的日常运营管理。此模式下,学校作为办学主导方,可充分表达办学需求,具有较高的办学自主性。

(一)合作方式创新:构建校际合作命运共同体

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与性质相近、利益趋同的合作伙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外方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国际化办学水平的需求和意愿较强烈,是相对理想的合作伙伴。中外学校平等交流、资源共享、双向赋能、合作共赢,构建校际合作命运共同体,是高质量开展境外办学的基础。创新合作方式,构建校际合作命运共同体,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选择满足一定条件的外方合作院校

一定条件是指,双方办学目标一致,专业设置相近,且外方学校能提供必要的教学与实训场所,具备较为丰富的当地企业资源。此外,外方学校所在地社会稳定、治安良好、交通方便等也是需要考虑的条件。在具备良好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双方可坦诚、深入交流意见,联合设计办学规划和实施方案,共同投入资源建设境外办学点,共同参与境外办学点的运营与管理。

2. 加快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双方应充分向对方开放教育资源,包括课程资源、教师资源、企业资源和文化资源,联合开展多种类型的国际教育项目,以更积极、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开展合作。

3. 兼顾双方的利益

外方学校在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等方面有一定的追求,中国高职院校应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前提下,根据投入情况、办学效益,兼顾好外方学校的利益。在充分保障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健康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

(二)建设内容创新:创建境外办学“五大平台”

目前高职院校境外办学的内容还较为单一,技术技能培训占据了较大比重,仅少数高职院校涉足学历教育、课程开发等。在“校际合作”模式下,中外学校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在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深度合作,创建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专业建

设、“中文+职业技能”培训、国际校企合作、中外人文交流等五大平台,建设完备的境外办学内容体系(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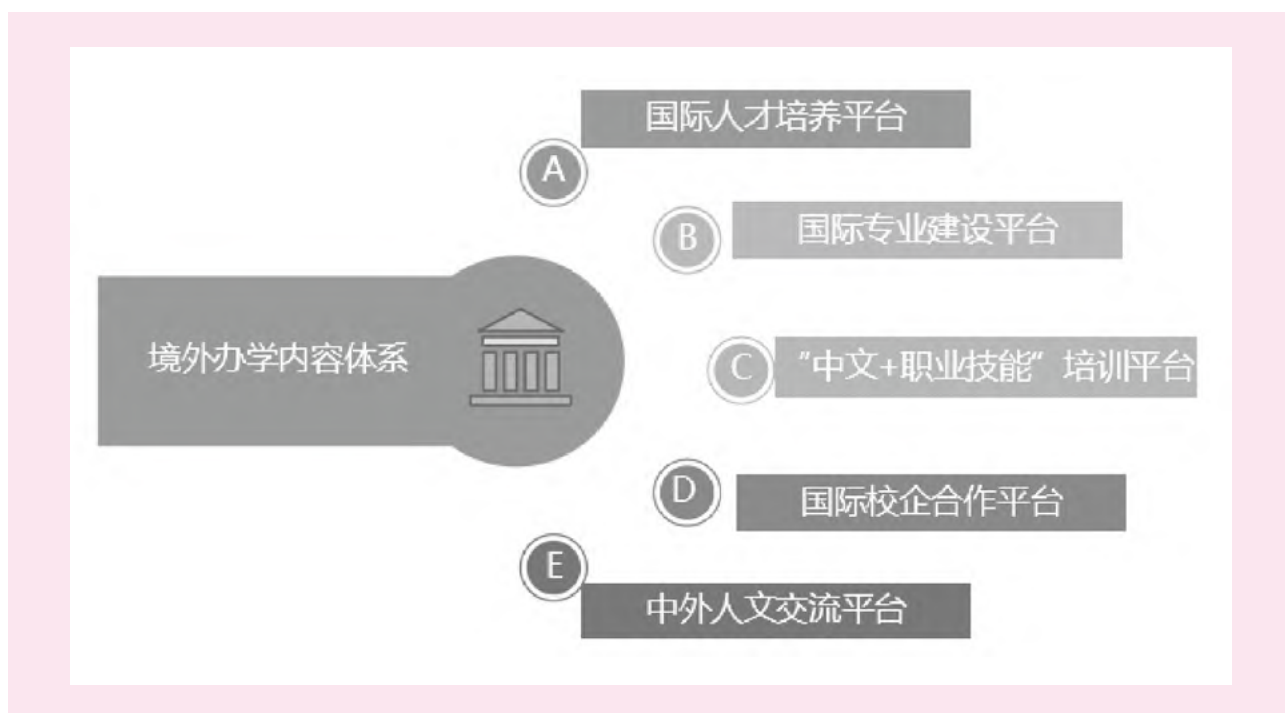


图4 境外办学五大平台

中外学校共同创建的系列国际教育项目,既是境外办学的具体内容,也为各平台提供了支撑。国际人才培养平台之下,可创建来华留学生培养、国际学生当地培养和海外学历提升等项目;国际专业建设平台之下,可创建中外合作办学、国际专业标准开发与认证和双语课程开发等项目;“中文+职业技能”培训平台之下,可创建企业员工培训、社会学员培训、教师培训和职业技能认证等项目;国际校企合作平台之下,可创建海外实习就业、技术技能开发、员工继续教育和国际“双师”培养等项目;中外人文交流平台之下,可创建学生交流交换、多元文化沙龙和外籍专家交流引进等项目。

(三)思维手段创新:运用互联网思维和现代远程教育技术

“校际合作”模式下,中外学校可创新办学思路、优化教育手段,开发丰富的境外办学教育资源。

一是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境外办学活动,持续创新办学思路和理念。在全面开放、万物互联时代,开展境外办学,有必要对合作对象、培养对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走出去”企业和当地企业人才需求乃至对整个境外办学生态进行审视和思考。具体而言,中外学校应秉持对等、开放、容错、共享、去中心、自组织等互联网思维,相融相促,大胆尝试,充分

利用资源,夯实五大平台,灵活开展各类教育项目,将办学合作推向深入。

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开展远程职业技术教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交织影响下,人员跨境受限,中外学校可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开展“云交流”“云课堂”“云研讨”“云培训”,深度实施在地国际化,实现空中赋能。

综上所述,“双高”建设背景下,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走出去”增加了更多内涵,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的实践日益增多。本文所探讨的“校际合作”境外办学模式,是解决境外办学痛点难点的有益探索,具备可行性。随着境外办学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也会走向深入,一定会有更加科学、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现。

参考文献:

- [1] 刁翔正.“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研究综述[J].西部学刊,2021(7):128-131.
- [2] 柳玖玲.“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实践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9:34.
- [3] 周萍.“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存在的问题与路径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18):243-244.

- [4] 赵丽.“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实践——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9):64-68.
- [5] 周燕,唐正清,陈洋,等.高职教育“政行企校”协同海外办学

运行机制探究——以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51-56.

[责任编辑:许海燕]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School-running Mode of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High Plan

ZHANG Zi-yi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fice, Wuhan Polytechnic,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High Plan, running schools overseas is increas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is stage, the three main overseas school-running modes are government-led, going overseas with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al co-construction. But problems exist such as difficulty in promotion and replication, the obscured role of schools as the main and leading subjects in running schools, and difficulty in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running schools. However,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cooperation methods,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thinking metho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verseas school-running mode of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the pain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running schools abroad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Key words: Double High Plan construction, overseas schools, inter-school cooperation